

基督教之基礎

考茨基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基督教之基礎

考茨基著

葉啓芳等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Karl Kautsky

THE FOUNDATION OF CHRISTIANITY

本書根據第十三次德文版翻譯的英文本轉譯。原著以德文出版。原作者是 K. Kautsky。原著名稱是 Der 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美國國際出版社出版。

基督教之基礎

〔德〕老茅是著

葉啓芳等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112·850×1168 1/32·1514 2 插頁 240 060 子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6,500 定價：(7) 1.90元

譯者前記

本書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基督教的起源，指出基督教實是一種反羅馬帝國主義和反猶太僧侶政治的革命運動，是一種巴力斯坦被壓迫人民的反抗鬥爭，其後又說明基督教在演進過程中怎樣喪失了它的原始意義，怎樣由一種革命鬥爭的組織一變而成爲帝國主義和僧侶政治的工具。

西方研究基督教的書籍，多如牛毛，但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作爲研究方法的很少。這本書一方面完成了以新觀點分析一種古代社會運動根源的企圖，另一方面又證明了這一種觀點實爲任何歷史研究的唯一可靠的方法。

譯稿曾在一九三二年由神州國光社第一次出版。爲着這次重版，譯者曾把全書修訂一遍，但錯誤仍屬不少，希望讀者批評和指正。

本譯本所根據的英文本是從第十三次德文版逐譯的，英文本經原作者審定過，由美國國際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四年九月四日譯者誌

目 次

引 論	9
-----------	---

第一篇 耶穌的人格

第一章 異教的史料	23
第二章 基督教的史料	30
第三章 關於耶穌的形像的鬥爭	41

第二篇 羅馬帝國時代的社會

第一章 蓄奴制度	49
一 土地所有	49
二 家庭奴隸	51
三 商品生產中的奴隸	54
四 蓄奴制度的技術上的較劣性	60
五 經濟的衰落	68
第二章 國家的生活	85
一 國家與貿易	85
二 平民與貴族	92
三 羅馬的國家	95
四 高利貸	101
五 專制政治	106
第三章 羅馬帝國時代之思潮	112
一 各種社會束縛之日漸削弱	112

二	輕信性	127
三	謊言之應用	139
四	人道主義	146
五	國際主義	160
六	崇尚宗教的趨勢	166
七	一神主義	176

第三篇 猶太民族

第一章	以色列民族	185
一	閃米特部落之遷移	185
二	巴力斯坦	188
三	古代以色列民族之神的概念	198
四	商業和哲學	201
五	商業和民族性	207
六	迦南爲各個民族之通道	211
七	以色列族之階級鬥爭	215
八	以色列族之滅亡	218
九	耶路撒冷之第一次毀滅	221
第二章	放逐後之猶太人	226
一	放逐	226
二	猶太人放逐後之散居	242
三	猶太人之佈道方法	253
四	猶太人之怨恨	264
五	耶路撒冷	271
六	撒土該黨	274
七	法利賽黨	287
八	熱狂派	298
九	敬虔派	310

第四篇 基督教之起源

第一章 早期基督教會	327
一 教會之無產階級的性質	327
二 階級之憎恨	332
三 共產主義	336
四 對於共產主義之反對	341
五 勞動之藐視	351
六 家庭之毀滅	352
第二章 基督教之彌賽亞的觀念	361
一 上帝國之降臨	361
二 耶穌之族譜	367
三 叛徒之耶穌	370
四 釘死後之復活	378
五 世界之救主	386
第三章 猶太的基督徒及異邦的基督徒	389
一 異邦之宣傳	389
二 猶太人與基督徒之反抗	394
第四章 基督受難的故事	402
第五章 教會組織之演進	415
一 無產階級及奴隸	415
二 共產主義之衰微	422
三 使徒，先知，及教師	430
四 主教	441
五 僧院制度	456
第六章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	466

引 論

我對於基督教和“聖經”考證久已感覺興味了。二十年前，我曾在“宇宙”(Kosmos)中發表一篇論及史前時代的“聖經史”的起源的文章，兩年後，我又爲“新時代”(Neue Zeit)做過一篇論及基督教起源的文章。所以我現在只不過是再復從事於一種舊的工作。我這一回之所以再復從事這種工作是因為我要預備再版我的“社會主義之先鋒”(Forerunners of Socialism)的緣故。

批評我那本書的人的各種意見——就我所曾讀過的而論——所特別指摘的是那本書的引論。我在引論中曾簡略地說過原始基督教的共產主義。他們說，我的見解實與最近的各種考察所引起的知識不相符合。

自從這些批評發表後，不久葛爾(Göhre)等便說，這種最初爲包爾(Bruno Bauer)所提倡，其後爲梅林(Franz Mehring)和我所大致接受，並且在一八八五年即早已爲我所規定的見解——就是，我們斷不能對於耶穌的人格有什麼定論，而我們在解釋基督教時又可以把這個人格置之不顧——現在已變成陳廢的舊見解了。

所以，我實在不想在未首先根據最近的文獻以小心修正我由以前的研究而得到關於基督教的各種見解之前，從新再版我那本出現於十三年前的書籍。

結果我得到一種稱意的結論，那就是，我並沒有改變舊日的見解的需要，不過，後來的各種考察却使我獲得許多新的觀點和新的獻議，因此我便把修改“社會主義之先鋒”的引論的工作擴大自成一書。

自然，我並不是說，我已經把這個問題發揮無餘，這個問題異常

廣大，沒有人是可以把它發揮無餘的。假如我已能把我站在唯物史觀的立場所認為最重要的幾方面——基督教的幾個方面——解釋明白，我便自視為滿意了。

我也不敢把我自己關於宗教史的各種問題的學問拿來和神學家比較。神學家以這種研究為他們的終身工作，而我却只能利用我的著述和政治活動所容許我有的少許餘暇時間以作此書。在我作此書的時期中——我所指的是由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開幕起至一九〇八年的土耳其革命爆發止的時期——任何參加當代的階級鬥爭的人都大有要用全副精神對付目前的急務之勢，因此實沒有什麼餘暇以顧及歷史的舊事。

可是，我對於無產者的階級鬥爭的積極參加，也許正足以使我對於原始基督教的真義獲得種種為“神學”及“宗教史”的教授們所得不到的觀察。

盧騷在所著“新哀綠綺思的情書”(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中曾說過：

“我覺得，想站在純粹觀察者的地位以研究社會(Le Monde)是可笑的舉動。只是想觀察的人是不會觀察得什麼出來的。因為他對於實際工作既無用處，又足以妨礙消遣，他斷不能夠得到實際工作或消遣的效果的。我們只能在我們自己動作所達到的限度之內觀察別人的動作。在‘世界’學校中，正好像在‘愛情’學校中一樣，我們必要首先實際練習我們所想學的東西。”(第二卷第十七札)

這個原則，在這裏只限於人的研究的原則，原可以擴而施諸一切事情的考察。無論在什麼地方，只是觀察而不實際參與實不會得到什麼的益處。即就對於遙遠的物體如星辰的觀察而言，也是如此。假如天文學只以純粹的觀察自限，不與實用聯合起來，不與望遠鏡，光帶分析，攝影術之類聯合起來，它現在會有什麼的成績！至於就這

個地球的各種事物——我們因為實用的緣故對於這些事物不能不有一種比純粹觀察遠較密切的關係——而言，這個原則便更加有效了。我們由純粹觀察事物而學得的東西，和我們因為實際工作與這些事物發生關係而學得的東西比較起來，實屬稀少得很。讀者只要追憶實驗方法在自然科學中所已達到的極端重要的地位，便可以明白這個道理了。

我們斷不能創製各種實驗以為考察人類社會的方法，可是考察家的實際活動却不因此而變成次要；然而，他的成功的條件和一種有成效的實驗的條件並無二致。這些條件就是：要知道別些考察家所已得到的種種最重要的結果，和要熟識一種足以使考察家漸次愈加了解每一種現象的主要點，足以使他辨別什麼是主要點什麼不是主要點，及足以揭露各種不同經驗的共通性的科學方法。

具有這些能幹，而又研究着一種他的實際活動所從事的工作的思想家不難獲得種種如果他站在一個純粹觀察者的地位便不能獲得的結論。

歷史的研究尤其是這樣。一個實際政治家，如果具有充分的科學訓練，實會比之一個對於政治的各種動力絕無一點實際關係的空論學者較易於了解政治的歷史，和較敏於找出他的研究方向。如果那個考察家所從事研究的是一種他所積極參與因而最能明瞭其特性的社會階級運動，則他更會覺得他的實際經驗有特殊的價值。

能够熟識事實的一向差不多只限於那些壟斷了學問的有產階級。社會的下層階級的各種運動至今還未找得到若干可以了解的學者。

基督教在出現之初，不用懷疑，原是最初的貧乏階級的一種運動，我們可以把這些階級總稱為“無產者”，假如這個名詞的意義不單是指工資勞動者而言。熟識近代的無產者運動，而又因為實際參加

這種運動而了解它在各國的形態中所含有的共通因素的人，已經識得生活於無產者的種種感情和想望中並和他們一道奮鬥的人，實可以自命能够比那些常常都只由遠處觀察無產者的學者們較易於了解許多關於基督教的原始的事情。

然而有科學訓練的實際政治家在從事於著作歷史的時候雖然從許多方面說都比之純粹書本的學者較佔優勢，他這種優勢却往往為實際政治家所易於接受的引誘所抵消。實際政治家的歷史作品比之別的考察家所較容易陷入的危險尤以下列兩種為著：第一，他們也許會企圖完全依照“現在”的模樣以鑄做“已往”；第二，他們也許會力求依照他們的目前的政策的需要以觀察已往。

不過我們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却覺得，我們實具有一種可以防避這些危險的絕好保障，那就是唯物史觀，與我們的無產者觀點有異常密切關係的唯物史觀。

傳統的歷史觀只把各種政治運動視作力求實現某些特殊政治制度——君主政治、貴族政治、民主政治等——的鬥爭，而這些制度又被認為各種特殊的道德見解和希望的結果。可是，如果我們的歷史觀不超出這一點之外，如果我們不求找出這些觀點、希望和制度的基礎，則我們不久便碰到下面的事實了：在數千年中，這些東西只發生種種表面的變化，其實質始終也一樣；我們所論及的始終是不停地重複出現的同樣的觀念、希望和制度；歷史的整體原是一種力求實現自由平等的長期的不斷的鬥爭，這種自由平等屢屢碰到壓迫和不平等的打擊，永未嘗實現，然而又永未嘗完全被消滅。

提倡自由平等的人一旦獲得成功，便必然的把他們的成功化為新壓迫和新不平等的基礎，結果便馬上引起力求實現自由平等的新戰士。因此，整個歷史進程便似乎是一個常常都周而復始的循環，是一齣演完又復重演的戲劇，所改換的只是服色，人類在歷史中並沒有

真正的進步。

抱着這種觀點的人常常都好依照“現在”的模樣以描寫“已往”，他對於現在的人類的知識愈廣，便愈會力求依照人類現在的模樣以描寫以前各代的人類。與這種歷史觀相反的就是那種不視研究各種歷史觀念爲自足而力求找出它們的原因，即隱伏於社會的基礎之下的原因的歷史觀。在應用這種方法時，我們屢屢碰到生產方式，而這種生產方式又常常以技術進步的水平爲根據，雖然那不是它的唯一根據。

我們一旦從事考察古代的技術才能和生產方式，便馬上失却“同一的悲喜劇永遠重復表演於世界舞台中”的見解了。人類的經濟史指出一種漸次向上升高的不斷的進化，不過這種進化並不是絕無障礙或方向始終不變的。可是，我們一旦考察過人類在各個歷史時代中的經濟情況之後，便馬上失去“同樣的觀念、希望和政治制度不斷地重復出現”的錯覺了。我們這時已經明白，同一的名詞在時代的遷移中已經改變了它們的意義，外表上互相類似的觀念和制度實含有一種不同的內容，爲不同階級的需要和不同的形勢所引起的不同的內容。近代的無產者所要求的自由和第三階級(Third Estate)的代表們在一七八九年中所要求的自由實全不相同，而後一種自由又和日爾曼帝國的武士階級在宗教改革時代之初所奮鬥以求實現的自由根本有別。

我們一旦不把各種政治鬥爭視作只是與抽象的觀念或政治制度有關的衝突，而把這些鬥爭的經濟基礎揭露出來，便可以馬上明白，在這一個範圍中，正好像在技術和生產方式的範圍中一樣，也是有一種向着新形式而前進的不住的進化存於其間的，沒有一個時代是和任何別一個時代完全相同的，同一的口號和同一的論據是會因爲時代之變遷而具有很不相同的意義的。

我們的無產者觀點實可以使我們比之資產階級的考察家較易於了解原始基督教所同於近代的無產階級運動之諸方面。可是我們因為側重經濟情況——這是唯物史觀的一個必然的系論——又斷不會只因爲把捉這兩個時代的共通因素的緣故而陷於忘却古代無產者的特性的危險。古代的無產者的各種特性是因爲它的特殊的經濟地位而產生的，這種經濟地位雖然與近代無產者的經濟地位有許多相似之點，却使古代無產者的各種希望與近代無產者的各種希望完全不同。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一方面保衛着我們使我們不至陷入以“現在”的標準測度“已往”，及使我們更能了解每一個時代和每一個民族的特性，一方面又使我們不至陷入別一種的危險中，那就是，力求依照我們現在所防衛的目前實際利益以改變我們關於已往的敘述。

不錯，一切忠實的人，無論他所採取的是什麼觀點，都斷不會容許自己故意僞做歷史。可是社會科學的考察實最需要具有一種絕無成見的態度，而在社會科學中想保持這一種觀點又是最困難的事情。

因爲科學的職責不單在敘述事物的真相，不單在提供實況的一個忠實照片，藉以使任何常態的觀察者都可以構成一個相同的影像。科學的職責實在乎在所接收的一大堆印象和現象中觀察出其普通的、主要的因素，藉以提供一種可以使我們在實況的迷途中找出我們的方向的導綫。

並且，藝術的職責也是一樣。藝術也不單是給我們以實況的一個照片；藝術家必要把他所視爲主要之點，他所描寫的實況的特色表現出來。藝術與科學的分別就是：藝術家以一種物質的和可以觸摸的形式，藉以使我們獲得一種印象的形式，來表現主要之點；思想家則以概念，抽象的形式來表現主要之點。

一種現象愈加複雜，可以拿來和它比較的現象愈加稀少，則我們

便愈加難於分辨這種現象中的主要之點和偶然之處。考察家和表現者的主觀特色便愈加使人覺得。因此，他的觀察便愈加必要清楚和絕無成見。

最複雜的現象大抵就是人類社會，人類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實是比我們所知道的任何生物都較複雜的東西。並且，在同一的發展水平之上而可以拿來互相比較的社會的有機體，其數目又比較的少。所以，社會之科學的研究之出現得比任何別種經驗範圍的科學研究都較遲，原是不足爲奇的；社會科學的學者的意見之分歧得這麼厲害，也是不足爲奇的。

如果各考察家對於他們的考察的結果具有種種趨勢很不相同甚或往往相反的實際利害關係——這是在社會科學中所常見的情形——則上述的困難便變得愈加嚴重；這並不是說，這些實際利害關係必然是純粹的個人利害關係，它們可以是很確切的階級利害關係。

一個人如對於他自己的時代中的各種社會衝突和鬥爭有一種利害關係，而把這些現在的現象視作已往的衝突和鬥爭的一種重演，則他對於已往顯然不能保持一種公平的態度。已往的衝突和鬥爭由是便只變成現在的衝突和鬥爭的先例，包含着現在的衝突和鬥爭中應辯護的和應詬罵的兩方面，因爲在此時，“現在”是視乎我們對於“已往”的判斷爲轉移的。那一個對於他的使命有利害關係的人可以保持着公平的態度呢？他與他的使命的關係愈加密切，則那些似乎足以擁護他的見解的已往事實對於他便愈加變得重要——他便會側重它們，把它們當作主要的事實——至於那些似乎足以擁護相反的見解的事實，他便撇置不顧了。那個學者由是便變成一個道德家或一個辯護人，他之贊許或詆毀某種特殊的已往現象完全是因爲他是現在的相同的現象——如教會、君主政治、民主政治等——的辯護人或仇敵的緣故。

然而，如果那個學者因為具有充分的經濟知識的緣故而承認歷史中並沒有純粹重演的事情，已往的經濟情況一去永不復回，舊日的各種階級衝突和階級鬥爭與現在的階級衝突和階級鬥爭根本不相同，因此我們的各種近代制度和觀念雖然外表上與舊日的相似，其內容却完全二致——則情形便不同了。那個學者這時便明白，每一個時代必要為它自己的標準所計量，現在的各種希望必要以現在的情形為根據，已往的各種成功失敗單就其本身論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只祈求已往來辯護現在的要求也許會陷於絕對錯誤。法國的民主黨和無產者在上一世紀內，當他們過度信賴法國革命的各種“教訓”而不了解實際存在的各種階級關係時，已經屢屢發見這種道理了。

採取經濟史觀的立場的人，即使積極參與現在的各種實際鬥爭，也可以對於已往持着一種絕無成見的觀察。他的工作只足以使他對於許多各種已往的現象的觀察變成較為清楚，而不會使他的觀察變成朦朧。

這就是我敘述原始基督教的起源的目的。我並沒有讚揚基督教或蔑視它的立意，我所想的只是了解它。我知道，無論我得到什麼樣的結果，我所奮鬥以擁護的使命並不會因此蒙受損害。無論我覺得“帝國時代”的無產者是什麼樣的無產者，他們的希望是什麼樣的希望，那些希望的結果是什麼樣的結果，他們都決然與近代的無產者完全不同，他們的鬥爭和工作所處的形勢和所用的才力都和現在完全不同。無論古代的無產者有什麼偉大成績和勝利，有什麼欠缺和失敗，我們都斷不能根據他們來推測近代的無產者的性質和前途——不論我們所採取的立場是一種有利於近代的無產者的立場還是一種反對他們的立場。

然則研究歷史究竟有沒有任何實際目的呢？普通的見解往往把歷史視作航行於政治活動的海洋中的人的航海圖；這個航海圖必然

指出從前的航海家所不幸碰到的各種礁石和淺灘，藉以使後人可以安然航渡。可是，歷史中的可航行的路綫既然不住地發生變遷，礁石淺灘的位置既然不住地移易，每一個駕船者既然都必須重新測量海水之深淺以自定其航行路綫，只以舊航海圖爲嚮導既然往往適足以陷入迷途，則我們除了視之爲癖好之外，爲什麼還研究歷史呢？

讀者如有這種假設，實不啻“因糠棄麥”。

假如我們還運用着上邊的比方，則我們必須承認，駕船者實不能把歷史用作一種恆久的航海圖；可是這並不是說，它對於他並沒有別種用途；他是可以由它取得別種用處的，不過那種用處是一種不同性質的用處罷了。他必須利用歷史來做一種測量海水深淺的方針，來做一種研究他所航行的各種路綫，了解那些路綫和他在其中所處的位置的工具。了解現象的唯一方法就是研究怎樣發生。除非明白現在的社會怎樣變成這樣，它的各種現象——資本主義、封建制度、基督教、猶太教等——的發展的歷程，我們實不能夠了解現在的社會。

假如我們想清楚明白我們所隸屬或我們所附著的階級的社會作用、職責和前途，我們便必須了解現存的社會有機體，我們便必須從各方面認識它。然而除非考察過它的發展經過，我們實斷不能了解和認識它。不了解社會的進化便不能在階級鬥爭中變成一個有意識和眼光遠大的戰士。一個人如果沒有這種了解，便要依靠他對於目前的環境和目前的時間的各種印象以爲行動的嚮導，然而以這些印象爲嚮導是很危險的，這些印象往往是外表上似乎指出可以達到目的地的路綫而實際上却引人陷於礁石中的。

不錯，有許多階級鬥爭，雖然參與者並不清楚明白他們生存所在的社會的根本性質，也能獲得成功。可是這些鬥爭之所以能夠成功的各種條件現在已經漸次消滅了，正好像我們在現在的社會中之漸漸愈加不能單靠本能和習例以選擇飲食一樣。在簡單的，天然的情

況之下，這些嚮導也許足以做我們的選擇標準。我們的生活條件的人爲性因爲工業和自然科學日漸進展的緣故愈加濃厚，我們的生活條件愈加脫離自然界，則我們便愈加需要科學知識以在無限的人爲品中選擇最適於我們的機體的東西。當人類只以水爲飲料時，他們只要有一種可以使他們找尋清泉避免濁水的本能使够了。可是這種本能對於我們的各種製造飲料是沒有絲毫用處的；科學知識現在變成絕對必要了。

一般的政治和社會活動的情形正與此相似。在範圍往往窄小，情況簡單而又明顯，雖經數百年之久也沒有什麼變遷的古代社會中，習例和“單純的常識”——換言之，就是由個人經驗獲得的良好判斷力——已足以使一個人知道他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可是現在的社會和古代社會根本不同，現在的社會的範圍包括着整個世界，現在的社會不斷地發生變化，發生工業和社會革命，社會中的工人正在互相聯合以組成一支數以千百萬計的軍隊，社會中的資本家正在積聚着數以億計的金錢；在這麼樣的社會中，一個新興階級，不能視保存現狀爲滿足而必須以徹底改造社會爲目的的階級，斷不能單靠“單純的常識”和實際的人的局部工作以明智地和成功地指導它的階級鬥爭。每一個戰士都必須藉賴科學知識以擴大他的眼界，必須認識各種時間的和空間的偉大社會勢力的動作；他之所以必須這樣的目的不在消滅局部工作，或把它置之不顧，而在使它與整個社會程序發生一種密切的關係。因爲下邊的事實的緣故，他尤不能不這樣：現在幾乎包括整個地球在內的社會漸漸愈加推進分工的制度，愈加以一種特別事情和一種特別動作爲個人的工作之限制，因而漸漸愈加減少思想程度，使他愈加要依靠別人及愈加不能了解同時大大擴張的整個社會程序。

因此，每一個以推進無產者的進展爲終身事業的人都應該極力